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3.3

5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社會學作為志業

Raewyn Connell,
Randolf David

革命與反革命

Nazanin Shahrokni,
Parastoo Dokouhaki,
Simin Fadaee,
Abbas Varij Kazemi, Mona
Abaza

危機中的大學

Satendra Kumar,
Klaus Dörre,
Stephan Lessenmich, Ingo
Singe

- > 墨西哥都市暴力的常態化
- > 墨西哥青年的社會分化
- > 當代日本的不平等
- > 簡單的美：俳句
- > Bilba的執行委員會議
- > 介紹波蘭團隊
- > 加拿大社會學歡迎各位
- > 給主編的信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3期 / 2013/5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編的話

危機中的大學

當我在寫這文章時，Raewyn Connell正在University of Sydney解釋社會學作為志業的含意。她也加入學術和行政人員的罷工行列，抗議終身職的縮減、臨時約聘的增加、以及對大學自由的威脅。這是全球的大學所正面臨的問題。

當大學從公共財變成私有財時，大學就開始販賣商品給顧客。顧客包括了學生、國家、企業、以及任何可以兜售其商品的對象。爭取顧客上門變得很競爭，所以大學就要拼命擠入世界排名。學者或許不喜歡這些排名，可是還是要想辦法競爭到底。這意味著不只要發表到英文期刊，還要發表到國際都接受的期刊才可以。這些期刊都是美國或英國的國內期刊，擁有權力並用他們自己國內的模式設定問題、議題、方法。南方的社會學者因此脫離自己的社會越來越遙遠。

很少人有資源、有勇氣、或是有興趣去挑戰這個結構。所以，這期全球對話中我們看到的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和德國社會學會抗議其國家的學術排名，的確值得我們大聲喝采。別忘了，有很多大學甚至不在名單之中啊，這些學校有如消失一般。Satendra Kumar檢視了在印度的Uttar Pradesh中政客如何設立野雞大學、賺取國家的學費補助，發給毫無價值的文憑。在此，公共資金全都進了政客私人的口袋。大學變成賺錢機器。這雖是University of Sydney的另一個對立面，不過面臨的結構壓力是相似的。

當然，大學也面臨許多傳統的危機。Nazanin Shahrokni和Parastoo Dokouhaki描繪了伊朗政府為了控制女性入學名額而產生的非預期惡果。而伊朗的綠運動者在2009年就是從這些大學中畢業的(Abbas Varij Kazemi和Simin Fadaee的文章)。不意外地，伊朗政府仍緊盯著這些大學。

這些案例中我們看到社會和大學之間的界線變模糊了，我們不能老是假裝我們不是社會中的一分子。所以，我們必須選邊站。我們要和市場站在一起，還是要和公眾抗議者站在一起？Randy David對於社會學志業的討論讓我們看到，即使在菲律賓這個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學者仍是可以介入公共領域進行批判。不過，要進入像是埃及和墨西哥這種暴力常態化的國度去從事批判志業，還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與決心才可以。總之，我們在這邊說的這些或許不中聽，但我想這總比默不作聲好上太多。

全球對話以15種語言刊出，請至[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burawoy@berkeley.edu



Raewyn Connell是澳洲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也是Southern Theory一書的作者。她認為社會學者是勞動大眾的一員，而學術正被資本主義侵蝕中。



Randolf David著名的社會學家，描述公眾社會學的批判與投身政治有多麼第不同。



Nazanin Shahrokni和Parastoo Dokouhaki說明伊朗的大學女性人口增加如何導致性別隔離，以及國家機器怎麼保護男性勞動市場。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ğ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Yoshimichi Sato,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Célia da Graça Arriba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Rossana Marinho,
A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Katherine Gaitán.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Saghar Bozorgi,
Najmeh Taheri.

日本:

Kazuhi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Takako Sato,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Yutaka Maeda, Shuhei Naka.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Zofia Włodarczyk,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Justyna
Witkowska, Konrad Siemaszko, Julia Legat.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Ileana-Cinziana Surdu, Lucian Rotariu,
Angelica Helena Marinescu, Adriana Bondor, Alina Stan,
Andreea Acasandre, Catalina Gulie, Monica Alexandru,
Mara Șerban, Ioana Cărtărescu, Telegdy Balazs,
Marian Mihai Bogdan,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ș,
Ramona Cantaragiu, Elena Tudor, Monica Nădrag.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Ekaterina Moskaleva,
Julia Martinavichene.

臺灣:

何經戀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烏克蘭: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Polina Baitsym,
Mariy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tsova, Daria Korot-
kyh, Mariya Kuts,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Yulia Pryimak, Myroslava Romanchuk, Iryna Shosta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Mariya Vorotilina.

編輯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媒體顧問: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危機中的大學 2

社會學作為志業：全球共同合作
by Raewyn Connell, 澳洲 4

社會學作為志業：批判性地參與公共領域
by Randolph S. David, 菲律賓 6

> 革命與反革命

伊朗的大學的性別隔離：反作用力
by Nazanin Shahrokni, 美國；Parastoo Dokouhaki, 伊朗 8

伊朗綠運動的背後主角？
Simin Fadaee, 德國 11

挪用歷史：伊朗的綠運動
by Abbas Varij Kazemi, 美國 13

埃及反革命的暴力
by Mona Abaza, 埃及 16

> 危機中的大學

印度大學成為營利機器
by Satendra Kumar, 印度 19

德國社會學家抗議學術排名
by Klaus Dörre, Stephan Lessenich, and Ingo Singe, 德國 21

> 墨西哥

可綁架性：墨西哥都市暴力的常態化
Ana Villarreal, 墨西哥、美國 23

墨西哥青年的社會分化
by Gonzalo A. Saraví, 墨西哥 25

> 日本

當代日本的不平等
by Sawako Shirahase, 日本 27

簡單的美：俳句
by Koichi Hasegawa, 日本 28

> ISA

BiIba的執行委員會議(2013/3/10-16)
by Michael Burawoy, 美國 30

介紹波蘭團隊
by Karolina Mikołajewska, 波蘭 33

加拿大社會學歡迎各位
by Patrizia Albanese, 加拿大 35

給主編的信
by David Lehman, Hilary Rose, 英國 37



> 社會學作為志業 全球共同合作

by Raewyn Connell,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洲



Raewyn Connell.

Raewyn Connell 是澳洲社會學家。她的研究包括了階級權力、學校中的性別與階級關係。她著名的作品包括 *Gender and Power* (1987)。像是 *Masculinities* (1995) 則全球知名，其中霸權男子性是最為廣泛引用的概念。Connell 對歷史社會學始終抱持高度興趣，而且對於北方理論與主流社會學有著強烈的批判。其高度爭議性的文章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 後來發展成專書 *Southern Theory* (2007)，呼籲重視南方理論家。若這些上述著作有共同的交集，那我想就是她認為知識必須被放在其生產的脈絡下才可能被理解。更多請到 <http://www.raewynconnell.net/>

若你是社會學家，那麼你也是勞動者，你有工作，是勞動力的一部分。理解這點可以幫你從豪華壯麗裡除魅，也讓你思考你和其他工作者的關係。你的工作就是生產知識，教學，然後運用知識。這是一個集體的工作，不是個人的事業。社會學和自然科學一樣，目的在於分享知識，其本質就是公共的。傳遞知識是公共行動。你透過對於社會的瞭解，貢獻給整個社會，這也是你為什麼是社會學家的理由。

> 尋覓社會學

我 1960 年還是學生的時候，沒什人在教社會學。我有個歷史系學位，然後有另一個政治系的學位。這些是很好的訓練沒錯，問題是當時整個世界已經在沸騰了。所以我參與學生運動，反越戰，挑戰大學的保守主義。我們要求更多的更入世、更有價值的知識。所以我們自己動手，要成立一個業餘的自由大學去做這件事。

我博士畢業後到了美國，到了一個知名的社會系，想找答案。我發現該系分裂成激進的學生和保守的老師。該學校因為學生罷課而關閉了。但我讀了很多很棒的書，像是 Lévi-Strauss, Sartre, Mills, Gouldner, Lazarsfeld 等等。後來我發現他們都是男性，都是白人，都是所謂的北方理論。因此後來我想接觸更多其它的作者，就閱讀得更廣泛。

後來回到了澳洲，我參與了一個新大學成立社會系的計畫。我們一群人可以從無到有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系，是何等幸運的歷史時刻。今日雖然對於教師的限制越來越多，不過還是有空間給予創意課程的發揮。

> 制度

在澳洲，大約一半的的大學課程都不是終身職

>>

教授在教的。許多高學歷的年輕人只能做些臨時的工作，教一些課，在兩、三個大學之間兼差。誰會把這個稱作志業？何況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連終身職教授也在兼差。

從這個觀點看來，你要學者為社會學奉獻，簡直強人所難。你要他們兼差，然後還要發表期刊、參加會議、主持計畫、然後參與社群？可是新自由主義就是喜歡衡量個人的工作績效，不管你的工作環境。他們看你的聲望排名，看你可以拿到多少錢的計畫，看你寫了幾篇文章等等，這些就是大學裡的籌碼，就像企業界裡的個人表現一樣。40年前，Claus Offe 在一本傑出的著作 *Industry and Inequality* 中就說到這個世界瘋了。組織那麼複雜，其實很難去理性的判斷什麼工作成果是歸功於誰的。這個觀點其實來自於社會學，只是我們的專家們大概都忘了。

反過來，我們看到的是業界漸漸佔領了學術，把個人職業生涯塑造成好像就是志業一樣。企業家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總會說他們願意為了股東和公司不惜一切打拼，然後這個熱情到了被挖角那一刻馬上就消失了。在大學裡面要賺大錢不太可能，不過真真實實地分享我們所知道的、切身相關的重要知識，是再容易不過的一件事了。

> 社會學知識

可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學術界可是大有問題。社會學思想從 19 世紀的帝國主義和 20 世紀的經驗主義累積而來，也受到勞工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啟發，以及被一些知識派系像是功能論或是解構主義所影響。社會學理論是相當歐洲中心的。社會學研究很機械化、一直在重複。電腦本來是用來處理資料用，可是卻取代了你對真實問題的理解。就像 Thandika Mkandawire 所說的，在發展國家的社會學就像是對窮人的窮研究：沒錢、短期、不夠深入。

所以社會學需要先批判社會學。我認為要掀起這個北方社會學的霸權，首先要把南方社會學理論和後殖民理論帶入。當然，對於這個看法的反動非常強，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北方社會學已經整個制度化，有那麼多的社會學家靠這個吃飯。對抗起來，當然不容易。

社會學研究其實很難，我的意思是，很難做得好。我建議我的學生把教科書放在書架上就好，直到你要說何謂斜角轉軸的時候，在拿出來看就好（對初學者的建議：忘掉斜角是什麼吧）。每個研究問題都是新問題，有重要性，不同的資源也在手邊，詮釋也重要。學習方法最好的方式就是動手去做。其次是閱讀好的文章，看他們怎麼解決問題。每個人都有他們心

目中最好的作品排序。我的是：Barrie Thorne 的 *Gender Play*；Robert Morrell 的 *From Boys to Gentlemen*，以及 Gordon Childe 的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所有這些作品都是非常辛苦努力的結晶，包括了長期的浸淫、大量的資料。沒有了這些，社會學想像只是空轉。

> 讀者與公眾

幾天以前我參加了一個午餐約會，去訪問一群年長女同志，她們叫做 55 Uppity (<http://55uppitty.com/>)。許多 Sydney 的女同志攝社群其實很快樂，談論世代交替，要讓年紀變得明顯。這裡，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社群正在想像自身，而且還是一個知識計畫的重新建構。

很多時候社會學家希望他們的作品有用，特別是針對其研究的特定群體或是制度。我有過很多這種反身性很強的研究計畫，包括了研究性和 AIDS 防治在澳洲的實踐 (Kippax et al., *Sustaining Safe Sex*)。還有教育不平等，主要對老師和政策制定者 (Connell et al., *Making the Difference; Schools & Social Justice*)。

在大學教書的社會學需要和其他群體有所連結，特別是那些運動社會學知識的群體。所以我很珍惜我和勞工運動長期下來的連結，他們也覺得我們對階級的研究很有用。此外還有老師與教育者，他們會覺得我們的教育研究有用。我學術生涯的後期其實是和教育學和社會工作有關，而不是在社會系。但是，潛在的讀者更是寬廣。有些社會學則進入媒體，有些透過網路、出版、翻譯、旅行、還有謠言傳播出去。當我知道有在巴西、愛沙尼亞、中國的讀者想聯絡我，我相當高興。所以，這也是我覺得社會學可以是全球志業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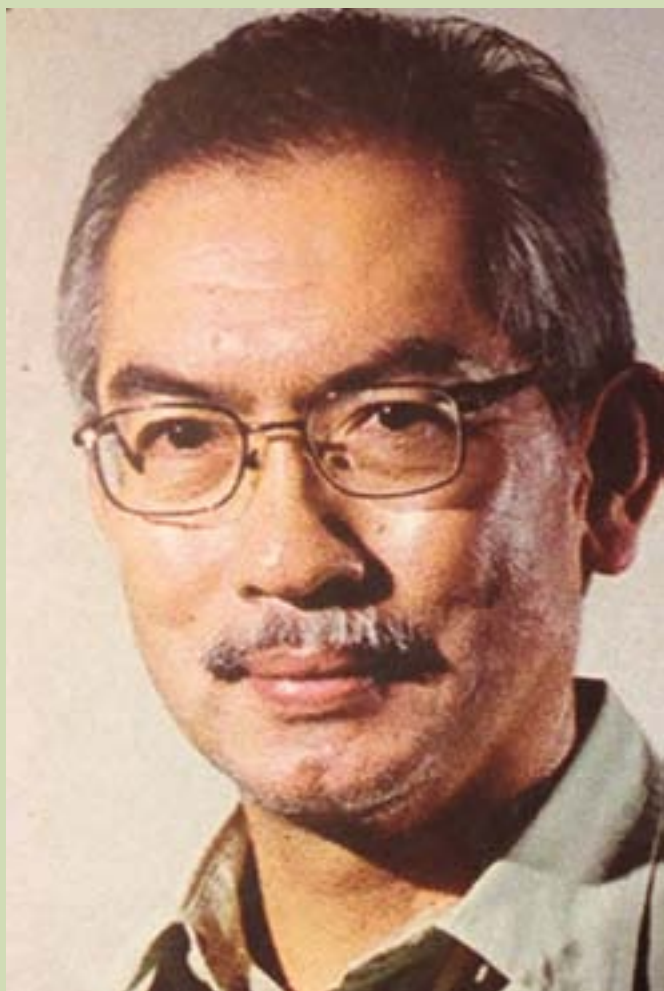
> 基本的目標？

我從事這行是因為我覺得社會學生產了關於許多社會問題的重要知識，像是暴力、不平等、災難等等。我至今仍這麼認為。社會科學可以扮演一個推進民主的重要角色，是社會自身知識的核心部份。我從中已經學到生產知識是多麼困難，以及知識要有用也相當困難。我也瞭解到必須從「全球的角度」(Samir Amin 的話)去思考這些議題。這是個令人望之卻步的觀點，但是很有啟發性。若社會學是志業的話，那一定不是什麼傳統宗教式的個人召喚，而是集體、全球的努力。■

> 社會學作為志業

批判性地參與公共領域

by Randolph S. David,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菲律賓



Randolf David.

Randolf David 是傑出的公共社會學者。他的著作：「民族國家、自我、公民身份：菲律賓社會學」得過許多獎項。他也是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其週日專欄「公共生活」發表在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上，而且從 1995 年就開始了。此外，他還主持公共電視的節目「公共論壇」。他是社會學學生口中的傳奇，也把社會學的視野帶到公眾之中。

社會學不是我的初戀。我會說我學社會學是出於理性，而非知識的理由。我 1960 年代在菲律賓大學唸書時，是想當律師的。我爸是律師，而且我認為律師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可是現在的學生到了學校都不是為了學習專業。

若一個人想要唸法律，那麼先修科目必需是政治學或是哲學，或是其他的社會科學。法律預備班的要求可接受任何的大學學位。這讓唸社會學的學生受惠良多。

我原本是主修英文系，畢業後是想當記者的。但是我夜間部修法律課。但是當時還年輕，志向很大。我大三時修了社會學導論課程當選修科目，因為該門課很甜，可輕易拿高分。我那時必須利

>>

用這科去拉我的平均才行。

後來，我卻愛上了社會學。在課程結束很久之後，我把課本重新拿出來翻。大四時，在我爸反對下，我轉到社會學。這是個意外插曲，卻決定了我此後的人生。我在社會學課程裡面遇到了我後來的妻子，而我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則完全轉變了我的政治立場。法律或許可以讓我有穩定的政治生涯。如果我唸法律，那麼我就會跟現在檯面上很多政治人物變成同學。

社會學給了我觀察菲律賓這個年輕社會很多的工具。藉由 Hannah Arendt 的話來說，我認為我被 pathos of wonder 所吸引，那就是觀察的慣習，必且不要找尋解決問題的快速解答。這也和激進的思想有關，在 60 年代其實社會學家很難不變成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政黨不一樣。後者必須服從革命的教條原則，限制了反思的能力。而一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則可以解決列寧政黨的問題，因為他不會忘記反身性的思考。此外，他也會總是不忘記觀察，因為觀察比行動要先。不同於意識形態，其自身的行動也是觀察的對象。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實踐從來就不是社會學的標誌。人們不會因為實踐的理由而喜歡上社會學。社會學主要的承諾是二階觀察：觀察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學家的態度去瞭解社會，而非焦慮怎麼有那麼多社會問題沒有解決。

這就是社會學不可逃避的立場。我們要去問是否在一個發展中社會有一個學科可以著重觀察而非解決問題。的確，我問我自己這個問題已經無數次了。

我仍然要說，一個學科致力於觀察而非解決問題，對社會是很重要的。觀察也要質疑暨有的框架。政治的志業需要的則是不同的東西。你若是總是致力於分析社會，那麼你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政

治人物。我認為反身性是政治最大的敵人。

我認為我很早就知道這點了，可是我錯了。2009 的某個時間點，我認為當時很不受到歡迎的總統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會競選國會議員以保住其搖搖欲墜的政治生命，而我想阻止他的辦法就是自己也去參選。我們在同一個選區。可是這是我最大的一個錯誤決定。

當我知道時，我發現我把自己投射成勇士大衛，想要打敗巨人哥立亞。這是多麼英勇的故事啊！這就是救贖般的偉大。可是，作為一位社會學家，我完全不知道跨界的風險所在。我從來沒有參選過，也沒錢，要怎麼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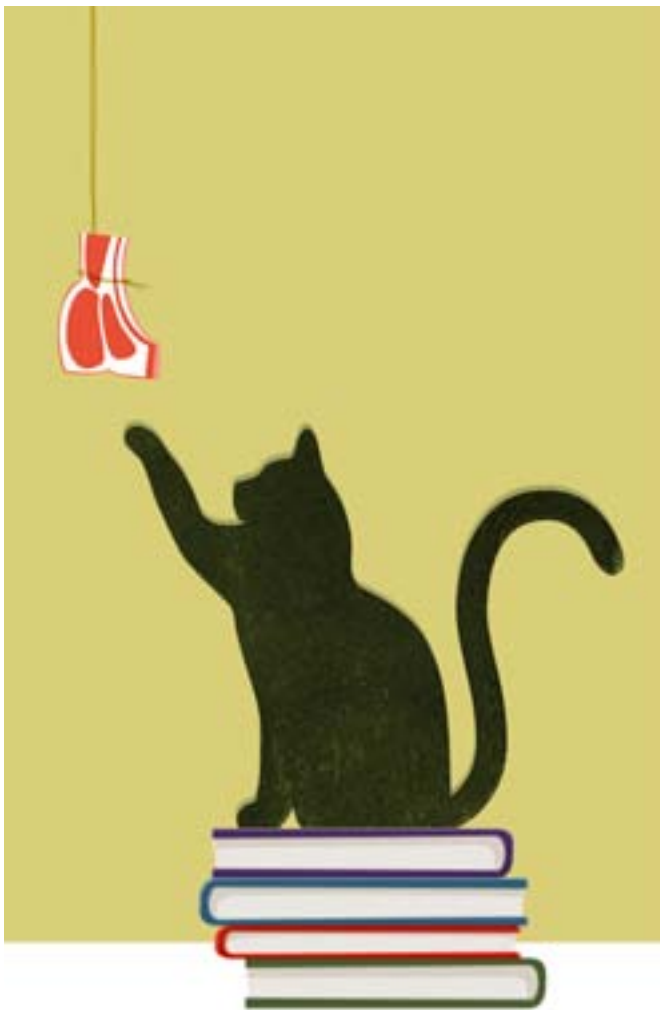
總之，我對於傳統政治可謂外行。我知道我面對權力時，我一點慾望也沒有。但是當時我開始準備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完全陌生的領域。有一天當我要填參選表格時，我毅然決然決定退出，因為我不想犧牲家庭時間。我的決定被許多我的朋友罵翻了，因為他們決定要去打一場偉大的戰役。

以知識作為武器，社會學家可以在公共領域發聲，也會發現自己始終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若你還想當社會學家，那麼必須避免成為一個政治人物，避免加入政黨。社會學家的志業是去審問政治，而不是去競逐權力。■

> 反作用力

伊朗的大學的性別隔離

by Nazanin Shahrokn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Parastoo Dokouhaki, journalist, Tehran, 伊朗



| Arbu繪

2012年8月6日，當新的學期年度接近時，伊朗政府支持的 Mehr News Agency 發表了一份公告，說明36所大學把女性排除在77個領域之外。這個公告引起了國際之間的憤怒。流亡英國的伊朗人權運動律師、諾貝爾得主 Shirin Ebadi 寫了一封信給聯合國秘書長 Ban Ki-Moon 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長 Navi Pillay 要譴責說：「伊朗的政策逼迫女性要待在家裡，因為他們在公共場合不被接納。」國務院發言人 Victoria Nuland 在8月21日閱讀的聲明之後要「伊朗政府去保護女性的權力，並且負起伊朗的國際責任，就是不要保證沒有歧視及平等的教育機會。」

在伊朗，高等教育的官員拒絕性別歧視的指控。總理 Kamran Daneshjoo 認為這種指控的說法是西方世界媒體的煽動，像是 BBC 或是 VOA。他說：「他們會生氣，那就表示我們做得是對的。」(1)

那學期即將開始時，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把伊朗和西方對立起來的局面是很虛假的。新的禁止命令其實影響到的不只是女性，還包括男性。這造成了長期以來的性別隔離局面。如此的作法像是倒退到早期伊斯蘭共和國時代一樣。在1980黏得時候，國家試圖要在物理空間上把女人跟男人分離，特別是在校園內。其所秉持的觀念是若把兩性混合，尤其在家以外的空間，那麼就是「非伊斯蘭」的，以及是背德的。今日，那些強硬派想要繼續「伊斯蘭化」化整個校園，也想要解決一個意外的歷史後果：校園的女性化。這新的性別隔離政策主要是在為男性設想，在教育、婚姻、工作皆是如此，而且是想要轉移國家經濟不景氣和高失業綠的注意力。

> 魔鬼藏在細節裡

>>



在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Khamenei陰影下的女人

所謂的性別隔離很複雜，但是主要都在校園裡面執行。

許多大學擴張了性別保護名額。這向制度造成了伊斯蘭共和國第一年的深刻影響，藉此，許多特別的空間只分配個單一性別。例如，Tehran 大學普遍被認為是最好的大學，把教室一半的空間給男性，另一半給女性。這樣一來就是一個 50-50 的系統。Shahid Beheshti 大學位於首都，則有 110 原則：60 給女性，50 給男性。其他學校則被化分成男性和女性兩大塊，至少在理論上是兩個平行的空間。男性在秋季班入學，而女性在春季班。而實際上這種管控和分離政策不被執行的時候，兩性是混合的。例如 Arak University 位於伊朗中部，Lorestan University 在西區山部，兩所學校就是如此。他們是很鄉村的學校，並實施這種政策。伊朗當局通常都用偏遠的學校去實驗這種爭議性的政策。而其他大學則保留了許多男性特權的空間。而理由都是為了某種經濟或文化的緣故，因為傳統文化把「男子性」視為相當重要。只有男性可以進入的單位可以得到媒體的青睞，但是許多制度也保留了相反的東西，那就是「女性專門空間」。在 2012 年，Shahid Chamran 大學就不招收男性到歷史系、波斯文學、心裡、教育等系。

可是這一切看不出來是一種新的性別隔離政策。許多大學似乎武斷地採用這種政策，並且劃分何謂男性，何謂女性的界線，負面影響相

當大。

性別隔離不是只有發生在入學許可而已。在 1980 年代，極端主義者和伊斯蘭共格國一起要求教室必須落實性別隔離，而且在許多場合，男女就被用區隔物一行一行地隔開。伊朗革命的領導者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據說反對這種方式。於是沒有了區隔物，可是性別還是繼續隔離著。這些例子可以在路上、教室、圖書館、咖啡廳中看見，有標記指著「姊妹」或「兄弟」可以去的區域。有三種限制因為難以執行而隨著時間消失了。學術部長 Daneshjoo 想要恢復這些限制：「從這個學年度開始，男性和女性將會分開坐，各個學院要督察是否落實。」(2)

Daneshjoo 也繼續向 Majles 和國會的神職人員宣導這個政策。整個部會說這個目標是為了建立只有女性的大學。(3) 但是我們還是持續看到這種性別隔離的現象，也要持續觀察是否這會帶給女性正面的影響。女性或許可以從此增加自己教育取得和職業取得。

> 棉花與火，肉與貓

Daneshjoo 在面對反對聲浪的時候說道，性別隔離政策是「Supreme Leader 所期盼的事情。」(4) 的確，儘管 Ayatollah Khamenei 反對使用區隔物，但是卻很支持性別隔離的理念。在 Mohammad Khatami 的改革政府之下也是如此。Khamenei 責備其科學部長，說道：「世界上是有很多國家主張性別混合，可是這裡是伊斯蘭國家，我們國家不主張那樣！」(5) Khamenei 的代表人 Hojjat-ol-Islam Nabiallah Fazlali, Khamenei 有一次在 Tehran 大學回憶到他的「痛苦記憶」和「不正常的校園友誼」時，說「女性和男性就像棉花和火」，繼續說道，「若不把兩者分開，棉花會起火！」而男女之間的吸引是「自然且性慾的」。若是「當你在一塊肉丟給貓，貓會不吃嗎？怎麼可能！」(6) 男性天生就是會把女性吃掉，很明顯，宗教的擔憂是男性。

在 2012 年早期有一個宗教電視節目，主要針對青少年。Hojjat-ol-Islam Naser Naghavian 是 Khamenei 文化代言人，在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任教，他說曾經有個男性青年學生問他，「當坐在一個女性背後有性衝動時，是被允許的嗎？」Motahhari 呼應說道：「若男女混合，那麼性關係就該被允許，像西方那樣。否則，壓抑性衝動會造成許多心理問題！」(7) 所以在這些人眼中，若是兩性自由地相處，男性就無時無刻必須壓抑性衝動。這個道德的邏輯就在於：若貓不能吃肉，那麼作法就是把肉拿開。

>>

> 現代女性的陰影

對於性的管制並不是性別隔離背後的唯一動機。在 1998 年，女性在大學入學數量上超越了男性，這是伊朗史上頭一遭。女性所站得比例已經逐年上升，整個女性化的方向並不限於大學教育這一塊。根據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女性文化分會的 Fereshteh Roohafza 之說法，過去已經有 269% 的女性教育比例的增加，而且若看碩士，成長則高達 26 倍之多。(8)

政府單位和國家審查的新聞單位總是引用女性識字率的高升來說明伊斯蘭共和國是支持女性的。而在權力核心內部，統計數據則引發很多焦慮。國會的教育委員會成員 Tayebeh Safaei 就擔心女性教育比例的增加。他說「這些平等的數據會造成社會危機！」(9) 但，什麼叫做社會危機？所有其他的保守派媒體都說男性正在失去教育優勢和工作機會。事實上，男性還是在工作市場上有很大優勢。可是這樣的言論總是引發一些男性榮耀論者的共鳴。「很顯然，男性變成了年輕的夥伴，Whipped 則最可以用來描繪當代男性。女性是中心，就像太陽，而男性就像衛星，沒用，屈從，如月亮一樣，只能反射太陽的光芒。」(10)

> 保護男人和國家

2012 年 9 月 15 日，國家出版的雜誌 Hamshahri Javan 的一期中說到了女性的成功，但是認為這是很危險的。主要的封面標題是：「舉起手來！女性佔領了社會：大學、運動、工作！下一個是哪裡？」

有一個女孩拿著一把步槍，低頭看著男孩，其陰影正好面對著牆壁。這樣的圖案來自於 1990 的日本卡通 My Daddy Long Legs，是以 1912 年美國小說 Daddy-Long-Legs 為藍圖撰寫的（作者 Jean Webster）。整個故事在說一位叫做 Judy Abbotts 的女孩因為一個有錢的男人而上了大學。這個訊息是想傳遞：伊朗的 Judy Abbotts 還沒有位男性作到什麼，反而威脅了男性的地位。

伊朗高等教育的女性化深深鑲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之中，而非政治的影響。反對性別隔離的社會運動不僅僅來自學生、老師，還來自於保守派婦女團體。批判相當的激烈，以至於一些大學像是 Shahid Chamran 已經取消了原本的禁令。

同時，從伊朗媒體得來的證據顯示官方還是堅持性別隔離政策，因為其主要關心的還是男性會受到威脅，不論在教育或工作上都是如此。國家想給男性生機，而不是要跟女性說再見。這不是關於男性的感覺而已。伊朗正處於

經濟危機中，失業率攀升，所以強硬派所掌控的國家會採取各種手段去平息失業男性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與動盪。這，我想才是伊朗政府最害怕的事情。■

- 1.Khabar Online, August 12, 2012.
- 2.Fararu, July 7, 2011.
- 3.Fars News Agency, July 5, 2011.
- 4.Student News Agency (Iran), October 24, 2011.
- 5.Radio Farda, November 20, 2009.
- 6.Parsine, July 6, 2011.
- 7.Khabar Online, October 1, 2011.
- 8.Fars News Agency, February 10, 2012.
- 9.Tebyan, July 10, 2012.
- 10.Rasekhoon, April 30, 2012.

> 伊朗綠運動的背後主角？

by Simin Fadaee, Humboldt University, 德國



紀錄片The Green Wave的海報，描繪綠運動

伊朗的綠運動是在 Mahmoud Ahmadinejad 的支持者於 2009 年大選後佔據街道後開始的。一開始他們抗議選舉結果。抗議者把自己轉變成複雜的人民運動，如此一來在文化上更有積極意義。在持續對於中東社會運動的辯論之後，我想要解釋伊朗綠運動的社會基礎。我認為，

真正的主角是我所謂的「後伊斯蘭氛圍」。這個氛圍是綠運動的核心。類似的氛圍也可以解釋其他阿拉伯世界的社運。

綠運動必須被放在全國社會運動（改革運動）的脈絡下來理解。這個運動從 1990 年代開始興起。此外，運動是回應伊斯蘭在 1979 年革命之後的宗教變革，以及 1980 年代

>>

之後的經濟改革。綠運動是此一系列回應的延續，也是整個改革運動的一環。

在革命之後，伊斯蘭便在伊朗變成了無所不在的結構。這意味著就有的制度都和伊斯蘭法律有關，新的伊斯蘭制度也被引進，在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控制著許多事情。在兩伊戰爭結束後，特別是 Ayatollah Khomeini 於 1988 的死亡，市場經濟變成了一支對抗伊斯蘭教的力量。這就是在這個意義之下改革運動得以可能的因素，因為改革訴諸多元的社會領域。

Pierre Bourdieu 說過人類對於差異的反應，是建立在自身的秉性（慣習）為基礎之上的。有著類似慣習的人、類似資源的人，會有類似的生活，進入類似的氛圍。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指出在 1990 年代伊朗 5 種重要的氛圍來自於伊斯蘭教和市場經濟的重疊之處。(1) 這裡我要再次強調其重要氛圍的其中之一就是「後伊斯蘭氛圍」，因為我認為這個是綠運動背後的主要推手。

後伊斯蘭氛圍是由都市

中產階級所組成，他們受過較多教育，使用網路，從事學術工作，藝術、文化、記者、學生等。他們也拒絕傳統的論述，拒絕傳統的伊斯蘭共和國，並且擁抱新事物。若和其他氛圍作個對照，這些人都有著高度的全球文化資本。他們會說外語，會到過外旅遊等。有人是過去伊斯蘭化的支持者，但是現在會反對伊斯蘭作為國家的基礎。把這個氛圍凝聚在一起的是社會多元文化的普片認知，對自由權、民主等事物的要求。

Mohammad Khatami 在 1997 的選舉和其支持者是這場改革運動的主要勝利者，可是 Ahmadinejad 贏得了 2005 年的選舉，因為他把焦點放在經濟和民生問題，訴諸於傳統中產階級、工人階級、以及農村階級。接下來的幾年這些團體因為高失業率和低迷的經濟成長而感到挫敗，2009 年的情況則更遭。此外，所有的改革成果都開始倒退回去了。

改變的氣氛始於 2009 大選之前，受到了大批改革者支持的候選人 Musavi 本有望贏得選舉，可是結果造成許多爭議。這個反

對派勢利進入了綠運動。綠運動也開始碰觸政治議題。

後伊斯蘭氛圍塑造了改革運動。但是這只是早期。後來綠運動的發展主要是由於其他社會團體，像是傳統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的加入而有轉變。因為制度的缺乏和經濟的蕭條，在加上普遍選舉權沒有落實，綠運動越來越像是政治反對運動。結果就是這個運動變成了一個伊朗政治、經濟、社會的重要改變動力來源。■

1. Fadaee, S. (2011)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Iranian Case," in Boike Rehbein (ed.)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in Emerging Societies*.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 挪用歷史

伊朗的綠運動

by Abbas Varij Kazemi, New York University, 美國



Photo: shaigan

FARS NEWS AGENCY

2009年伊朗發生了一場不常見的社會運動，稱之為「綠運動」。這是個環境抗議行動。主要因為總統大選的爭議結果、年輕人對改革的渴望、以及集體對於政治的樂觀主義。伊朗人上街要求司法與政治的改革。有些人認為綠運動是宗教運動。雖然宗教語言不是特別的明顯，不過運動者創新地挪用宗教論述，在新的脈

絡下產生新的意義。這場社運重新定義了諸多的符號與儀式，呼應了Michel de Certeau (1) 的戰略概念，意味著若是國家不允許社運的空間，那麼社運會自己找到出路。這個例子中，宗教就是新的場域。

國家的策略和人民當然很不同。在一個神權國家之中，隨處可見各種宗教儀式和符號，所以有許多的空間可以操作。因此，

綠運動自創的「Green Friday Prayer」，沿襲了伊斯蘭國家男女隔離的規範。

綠運動的宗教性就是「綠伊斯蘭」。這是一個新社運的論述基礎。Tehran 的中產階級是發起綠運動的主角。由此看來，伊朗的社會轉型不可避免地和中產階級有關，更和他們如何協商宗教與政治有關。

>>



綠運動挪用了綠色的歷史意含，並且重新政治化了綠色。

> 寧靜的抗議

2009年6月15日，一場寧靜的抗議誕生於德黑蘭街道上。在此3個月前，選舉文化才鋪天蓋地般充斥著街道而已。人們開始習慣在街上聚會，免於政治的恐懼，人們高舉雙手，迎接希望。選舉過後的6月15日，寧靜抗議誕生了，被視為是綠運動的分水嶺。這場抗議吸引了成百上千的支持者，一起遊行到Azadi廣場。這是一場寧靜的遊行，抗議者的手高舉者，不像選前那樣的激情，但是堅定地抗議著。這個寧靜抗議源自於人民對於政府限制公共集會的不滿。不像1979年的革命把Shah趕走，綠運動的參加者並沒有回歸日常生活，讓革命或國家主導一切。這些中產階級抗議者持續地堅持自己的訴求。雖然政府繼續鎮壓，不過抗議者總有新方法可以繼續表達不滿與訴求。

在伊朗這種威權文化底下，這場運動是怎麼發生的？我相信de Certeau的戰略與策略的這組概念可以用來

解釋這場運動的興起。在這個解釋框架底下，若反抗要在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之下得以可能，那麼只有透過不可見的、策略的、隱微的方式去實踐。運用de Certeau的框架，我將解釋綠運動怎麼去重新定義其運動目標和角色。

> 重新政治化綠這個顏色

我們可以從這個運動的名稱開始著手。在政治動盪的那幾個月，特別是總統大選期間，綠這個顏色就代表了抗議與不滿。這需要在伊朗的歷史脈絡下才得以理解：綠這個顏色有著濃厚的文化與宗教根源。此外，綠這個顏色在當時也有很深的宗教意義。什葉派的穆斯林認為綠色是神聖的，和先知默罕德與其家庭有關。過去，綠色的神聖本質也代表了抗議，是什葉派對遜尼派穆斯林的抗議。歷史上，什葉派的文化發展出一種反抗的精神，對抗政治。幾個世紀下來，什葉派透過用綠色去表達不滿，綠色的儀式用來悼念犧牲者。從16世紀開始，什葉

派變成了主導，則綠色成為了一種伊斯蘭中令人害怕的顏色。因此，2009年之前的伊朗，綠色就充滿了政治意義。在中產階級爆發社運之後，綠色從宗教反抗變成了政治反抗的代表。

在2009年總統大選的幾個元之前，Tehran的街道、車子、人們都裝扮成綠色。綠色隨處可見。即使在網路上，伊朗的部落客用綠色去代表其對運動的支持。這幅景象為都市生活帶來一股新意，也看到的政治改革的潛能。綠色沒成了Tehran中產階級服裝的基本款。這代表了要去改革這個病人膏肓的國家。此時此刻，綠色是一種抗議，更是一種風潮。

> 翻轉舊的口號

綠運動的策略是去挪用過去的1979年伊朗革命的口號：反對舊政權。伊朗革命之後，新的伊朗共和國政府用革命的口號當作官方意識形態。隨著時間過去，革命的口號已經被遺忘，政府也不再代表當初革命的精神。可是到了2009年，抗議重新找回了舊口號，賦予新生命。如此也把1979年帶了回來。中產階級用革命的口號去抗議。這樣的情緒代表了Ernst Bloch所謂的利用過去尚未實現的期望，已達到未來可無限可能。因此，

>>

綠運動重新喚起 1979 年的口號：「獨立、自由、伊斯蘭共和國。」這個口號後被媒體掛在嘴邊掛到都爛了，但是現在被運動者用來挑戰這個共和國自己。

雖然運動者個口號是伊斯蘭共和國，但是他們要傳達新的意思：「革命尚未成功！」被遺忘的政治如今重生，伴隨著口號：「Allah o Akbar」、「Ya Hussein, Mir Hussein」。前者在兩伊戰爭時變成了軍隊殺敵時呼喊的口號 (God is great)，後來在 2009 大選時在度政治化。「Ya Hussein, Mir Hossein」則是用來指涉死去的什葉派領導 Hossein Mousavi，他是反對派領袖，也是綠運動的英雄。如此以來，國教的語言被用來反抗國家自身。

> 記憶的政治

綠運動對於空間的不同使用也來自於什葉派的文化。什葉派文化來自於宗教的弱勢派別的歷史。政府對於宗教領袖 Imam Hussein 於 Karbala 在 Ashura Day (680 A.D.) 的謀殺之後，什葉派採用了這個口號：「每天，每個地方都是 Ashura and Karbala」。什葉穆斯林內化了這個口號，更成為了什葉派的象徵。這個傳統持續不斷地被敘說和記憶。雖然一開始的事件不是什葉的勝利，可是不斷地敘事把 Ashura 變成了現代伊朗的儀式一部分。像是早期的什葉穆斯林一樣，綠運動的示威者運動國定假日，像是學生節等，以及其他宗教事件，作為機會去組織抗議行動。這個景象也導致了非官方的節

日，像是綠節祈禱等，也都變成了運動者發聲的管道。

> 小媒體和政治

「你就是媒體」是一個非常有威力的運動口號。這個口號傳達訊息給政府，要政府知道媒體是有威力的，讓人們都有機會發生。反對派領袖 Mir Hossein Mousavi 曾經說：「政府一旦把門關上，我們就找窗戶；一旦關閉一家報紙，我們就成立新的一家。每一個部落格都被關閉，那我們就成立更多的部落格。」(2)

許多獨立報紙和網站的確都被關閉，電子郵件和簡訊就因此變成了傳遞訊息的工具，特別是在人們於街上抗議時。社會媒體網站像是臉書變成了消息來源。抗議者變成了記者，也變成了訊息提供者，利用相機和手機去傳達資訊與新聞，讓抗議變成了即時現場，全球共睹。

> 權力的版圖與記憶行動

綠運動從後宗教社會運動那裡得到了啟事。雖然運動利用宗教人物和宗教語言，不過這些元素並沒有受到宗教的限制，反而有了新的意義。我們應該知道，權力結構仍然籠罩著國家，反抗的努力常會被遺忘，特別是空間被國家佔據之後。在後選舉期間的抗議裡面，我們看到抗議活動後來嘎然終止，因為手機被斷線，簡訊被監控，綠色被禁止。公共集

會也越來越少。選後 6 週，所有抗議符號都不見了，生活回歸平日一般。不過同時，地下的塗鴉符號興起了，延續了抗議的風潮。新的地下反抗文化正在浮現中，人民在此是講述這個故事的主人。(3) ■

1.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http://www.irangreenvoice.com/article/2010/apr/18/2594>

3. 謝謝 Ali Sabbagi 和 Halima Adam 對於這篇文章英文版的修改。

> 埃及反革命 暴力

by Mona Abaza,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埃及



Icon Martyr Khaled Said在Alexandria被Mubarak政權的警察殺死。 Said的死是2011年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 Said被凌虐，也這個圖像在許多地方都看得到。 Mona Abaza繪圖。

很多埃及人一直想知道若是穆斯林兄弟政權的暴力不斷上演，那到底要怎麼在這個國家活下去。暴力這件事情讓很多人開始對於從2011年至今發生的事情有了另一種思考。許多人開始覺得，或許軍政

府要必現在這個政權好，因為穆斯林兄弟會政府其實無異於Mubarak政權的腐敗。人們開始注意穆斯林法西斯主義，不論在文章、評論，或是電視脫口秀節目上皆可見蹤跡。所以歐洲的歷史真的值得借鏡。

意思是說，不論是軍政府或是伊斯蘭政府，不論是兄弟會在前、軍人在後，即便是兩大陣營之間有著妥協、衝突，最終似乎都會引發一場戰爭，因為穆斯林的極端民族主義已經和軍隊所掌控的國家利益產生衝突了。軍人的政變可能來得比想像中的快。

不管怎樣，埃及過去幾個月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殺戮、綁架、毆打、死亡以及腫腫的蓄意暴力事件。另一方面。警察完全像是不曾存在一樣，棄人民生命安全於不顧，放任燒殺擄掠的發生，私刑取代了法律。在貧民窟的人相互殘殺，對於歹徒痛毆致死，以及攻擊警察局。

這一切讓我們重新反思這一切爭取公共文化的運動中，身體所扮演的角色。這個公共文化運動是一種不滿，不滿 Morsi 政府的宵禁政策。宵禁讓許多活動被禁止，從人民的日常活動到足球比賽等。當我寫這篇文章時正值 3 月初，公民不服從運動如火如荼在 Port Said 城市展開。

從 Morsi 掌權以來，埃及目睹了大量的犯罪暴力事件，包括謀殺、綁架等等。從他上台起，都市赤裸裸的暴力事件發生在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程度之大，已經讓人開始開玩笑說 Mubarak 還算是好人，至少比起現在這個暴力政府來說，好多了。當 Morsi 於 8 個月前掌政時，埃及抗議者的死亡人數破百（包括在 Port Said、

Alexandria, Ismailiyah、Suez、Rafah、Mansura、Mahalla al- Kubra 等城市的衝突，還不包括 Cairo 的 Tahrir Square 和 the Mohammed Mahmud Street II 的 2012 事件，以及總統府的多起抗議）。(1) 單單從 2013 年 1 月 25 日起至今，Port Said 市就有 53 人死亡。(2)

今天，許多人想問；Mubarak 政權有引起那麼多暴力事件嗎？我們別忘了在 Alexandria 的 Khaled Said 死亡是如何引發革命的。何況以前有那麼多的刑求案例。這些都是革命發生的原因。可是，革命後呢？改變了多少？

有個不同的點在於，我們現在看得到。我們現在正目睹大規模的暴力事件不斷上演，不斷侵害人性尊嚴，而這些暴力正是政府所施加的。這種集體對人性的污辱呈現在人們眼前，透過媒體報導，讓更多人知道。或許兄弟會的政府正在報復前政府對他們的暴力，想要掌控整個國家機器，安插自己的人事任命，最後建立一個神權國家。可是，這個政府卻是在不斷複製同樣的論述、方法、過程，無異於前政府，甚至更暴力。

上個月有一場集體抗議事件。若這不是集體反穆斯林兄弟會的活動，那麼肯定是個反革命運動。或許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精神科醫師指出在後 Mubarak 時代的精神分裂性格：要求建立伊斯蘭的道德國度，可是街道上種

種怵目驚心的暴力事件卻層出不窮。這個政權對付年輕運動者毫不手軟，不分男女皆以暴力對付。人們想知道，這到底是不是威權所滋養出來的文化，造成了長期以來的暴力文化？

從兄弟會政權開始殺戮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之後，我們見到了公共暴力的一種新形式，那就是造成抗議者之間的恐懼。12 月 5 日意外發生了，為了保護總統，政府軍開始公然殺人。(3) 媒體也都很震驚，大家也在電視上看得一清二楚，透過衛星頻道可以知道政府怎麼殺人的。CBC+2 頻道整晚報導這個恐怖的事件，畫面一直播放著政府殺人和綁架年輕示威者的影像。大家問道：這個新政府新在哪裡？一樣，這些暴力早就存在，了無新意。

YouTube 上可以看到很多政府的狙擊手是怎麼瞄準抗議者的。不僅如此，政府還殺路人、悼念人士等。政府軍的粗暴酷刑很明顯。300 到 400 人組成的集體強暴組織在 Tahrir 廣場強暴了 20 名婦女，目的是恐嚇女人不要上街。一連串的綁架、刑求等事件已經是家常便飯了。屍體總是被赤裸地丟棄在街上。這是 Popular Current Party 的 Mohammed al-Guindi 所遭受到的對待，但是政府說他是死於意外車禍。反對派媒體和人權組織指出這就是政府用來恐嚇對付他們的方



革命的開放博物館，繪製了許多革命先鋒圖像。這個博物館在總統府 Heliopolis 前。Tahrir 的博物館被警察拆掉好幾次，沒了。Mona Abaza 繪圖。

1. Al-Tahrir, February 16, 2013, p. 9.
2. The Egyptian Initiative for Human Rights, February 19, 2013, <http://eipr.org/pressrelease/2013/02/19/1635>
3. Tadros M. “Signs of Islamist Fascism in Egypt?”, December 8, 2012. Retrieved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opendemocracy.net/5050/mariz-tadros/signs-of-islamist-fascism-in-egypt>).
4. Al-Tahrir, February, 12, 2013.
5. Al-Tahrir, February, 12, 2013.
6. Al-Tahrir, February, 14, 2013.
7. Salem M. “The Horror”, Daily News, February 11, 2013, <http://www.dailynewsegypt.com/2013/02/11/the-horror/>
8. Ali N. al-Shuruq, February, 15, 2013.

式，要他們永遠閉嘴最好。例如集體強暴就是這樣。一群人會鎖定一個婦女，然後孤立她，扒光她的衣服，凌虐她，用刀子戳其下體。這些 Morsi 都視於無物。相同的暴力一直上演。而政府還責備女人不可以在街上亂晃，要對被強暴負起責任。這樣一來其實政府是在將暴力合法化。

在這種極端暴力之下，更有許多 4 月 6 日運動者和 Facebook 的管理者被殺和被恐嚇。Mahalla al Kubra 5 的團隊也是。當媒體報導在 Torah 和 al-Gabal-al Ahmar 監獄集中營的 114 名小孩時，沒看到刑求；(5) 可是當她們的父母找到這些小孩時，全部都被凌虐得面目全非，難以辨識。整個國家知道一個不過在 Tahrir 廣場上兜售馬鈴薯的 12 歲小孩如何被槍殺時，倍感震驚。(6) 他是被軍人瞄準射殺的，但是媒體報導是誤殺。更沒有人報導這

個小孩其實是個遊民。

許多的觀察提醒了我們這些暴力不是新鮮事。事實上，部落客 Sandmonkey (7) 和 Nelly Ali，兩位人類學家研究無家可歸的小孩 (8)，都說：埃及正在經歷的，無非就是 Mubarak 時代就開始的暴力文化。街上的小孩遭受這種強暴、凌虐、殺戮的對待已經很久了，就跟監獄變成集中營一樣，是以前就有的。新的東西是中產階級開始目睹這些事情，開始覺得恐懼。因為暴力不會發生在他們的家庭身上。過去幾個月來我們開始看到許多受難者來自中產階級家庭。這個父權的政府為了延續自身的命脈，就犧牲青春的肉體來獻祭。■

> 印度大學成為 營利機器

by Satendra Kumar,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Delhi, 印度



在Uttar Pradesh販賣學歷的廣告。

(CCSU) 是以農民領袖以及前總理為名，在 1966 年設立。該大學提供碩士、博士預備、博士學位。此外，大約 55 個學院設立於該校。雖然班級人數很多，基礎設施不足，導致教育品質低落，可是還是提供了很多人的學習機會。但是這一切到了 2000 年之後完全不同了。採取了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政策路線之後，預算不斷縮減，停止得到補助，沒錢開設課程，系所和學院的經費也都短缺，無法開課。(1)

全世界的大學都面臨商品化和管制的雙重壓力，印度的大學也不能倖免。在 1990 年早期，在全球化和世界銀行的主導下，印度政府宣布高等教育應該提高收費，以增加資源，並且鼓勵私人捐獻，透過私人諮詢等管道去開源。2000 年 4 月，總理貿易和工業部任命了由 Mukesh Ambani 和 Kumarmangalam Birla 所領導的團隊去進行了改革措施。這個團隊認為教育是營利事業，並且建議政府只能管制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應該由私人負責。接下來，高等教育的預算減少，新的人員也停止僱用。下面我會討論這個商品化如何導致了在 Meerut 和 Uttar Pradesh 的公共大學如何私有化。

Chaudhary Charan Singh University

該校要私人機構來經營大學的決定導致了企業公司決定了課程。然後這樣舉動也吸引了失業、失學的青年，某些人有在經營訓練課程。此外也吸引了政治人物。一夕之間，教室變成了職業訓練所。上千上萬公畝的公有地被分配給政治人物，這些人想要藉此洗錢，並從中抽稅獲利。(2)10 年之內，超過 350 間私人學校成立，如雨後春筍。CCSU 給了需多工程、管理、藥物、等其他的大學學位。很明顯地，沒有學校要給人文、社會科學、哲學等的學位。這樣的結果使得 CCSU 從公立大學變成了私人的營利機構。

國家解散公立大學以及富人階級的興學，造成了許多不平等的結果，特別是在教育和社會正義上。一開始，許多的

>>

學院成立毫無章法，沒有政府的允許。這使得很多學生沒有好的基礎設施和老師。今天你仍然可以發現學生只有註冊的時候看到一張紙，其他什麼都沒有。有些學院鑽法律漏洞，收窮人高額的非正規學費。(3)

為了要幫助貧窮和下層階級，獎學金被通常被發給那些卡司特學生 (Scheduled Caste) 去上職業課程。但是這並沒有幫助到社會正義，反而讓私人學校有營利的機會。許多私人學院和機構僱用諮詢顧問去得到這份卡司特學生的名單，挨家挨戶去調查。然後這些學生被要求去這些私人學校的職業訓練，藉此學校可以得到補助。許多案例都是學生並不對課程感興趣，可是被迫註冊。此外，與多學生也上兩種以上的課程，但都沒有背景知識。前者，學生不用上課就可以畢業；後者，學生什麼也得不到。不過兩者學要都可以獲利，因為可以獲得政府補助。

私人學院也變成選舉機器。許多政治人物成立職業學院為的是政治利益。在農村和郊區成立，是為了收買便宜的農地。這些政客把自己塑造成慈善家，幫助貧窮人口，也幫助更多人，營造這種行性。這些私人學校已經變成地方選舉動員網絡的一部分。那些窮人負不起規費，也無法上學，所以容易被收買。選取期間這些人就幫忙競選。

事實上，政治資源已經被用來擴張私人部門了。私有化不但開創了富人階級，擁有學校，提供教育給富人，還惡化了暨有的不平等，包括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很大一部份私人學校的畢業生要繼續學習以增強專業技能，也得不到高薪的工作。窮學生發現他們其實落入了圈

套之中。因此，結果就是這個階層體系的再生產，以及知識的工具化。我研究 Meerut 和 Western Uttar Pradesh 的這個現象，希望可以還有其他印度區域的研究可以比較，看看買票、賄選、貪污的情況。我想這和全世界的潮流相似，公共財正不斷被私有化，並被國家和資本家聯手推動。■

1 自己繳費的課程是要求學生負更多的錢去支撐一個課程的開設，學校負責提供場地、建築物老師、圖書館等。總之，政府用公共的錢去資助私人學校。

2 經營教育機構是一種社會服務，被認為是非營利且免稅的。

3 非正規學費是非正式的。在印度這是必要的。

學術排名

by Klaus Dörre, Stephan Lessenich, Ingo Singe,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德國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的碩士生
Johanna Sittel在Jena和許多其他人一
起抗議學術排名制度。

全球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學正在歷經結構性的轉變，這項轉變是由那些私人大學所帶領的。整個原則就是新公共管理，也就是說，大學變得越來越像私人企業。資源的分配要按照學術績效，學術資本主義也因此進入德國，透過評鑑排名控制大學體系。學術的縮編也都由量化指標所主導，包括了經費、人員數量等，完全忽視質化的面向。在學術圈工作的模式和內容都變得不一樣了，教學與研究越來越要配合管理責任。這裡有個內在績效評量的邏輯在，就是「多還要更多，永遠不嫌少」，導致工壓力生工，負荷過重，導致了反效果。

德國社會學會(GSA)已經決定要反對這個學術資本主義，抗議2013 CHE排名(高教發展中心)。這是德國最有影響力的排名系統，指標包括了教學研究成效，教授聲望，科學基礎設施，以及國際能見度。為此，透過訪問系所學生，老

>>

師等，由第三方進行評鑑。評鑑結果會公佈到 Die Zeit 雜誌上，所以對於高等教育相關人員來說可謂事關重大。

GSA 最近要求系所講師、學生不要參加這個評鑑。一開始是由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的社會系發起。該系被評鑑為最好的師資團隊，其教師利用這個名聲抵制評鑑。聲明在 2011 評鑑結果出爐後發出：

新發表在 Die Zeit 的 2011/12 CHE 評鑑排名將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的社會系排名在前。我們對於這項肯定相當高興。可是，我們質疑這個學術排名本身的正當性。我們認為這個排名的資料並不完整。而且大學排名會導致學術生態的競爭化，產生贏家和輸家，對於知識生產並無助益。所以社會系決定不參與下一次的評鑑。我們會和 GSA 合作去找出更好的方式。同時我們呼籲應該要有更合理的學術判斷方式，以及更好的資訊提供

給學生。

這個抗議受到媒體大幅的報導，同時受到 GSA 和德國多數社會系的響應。歷史、英文文學、化學、教育、政治系也決定不要接受 CHE 評鑑。

這項舉動並不被學校管理階層所支持。GSA 也說評鑑的原則還是適用。只是 GSA 的理事會在 2012 年 10 月決定要建立另一個給學生的資訊系統，並且成立一個工作小組「Task Force Studiengangsevaluation」去討論替代方法，使得評鑑更具有效度。抗議將會在 2013 年夏天進入高峰期，屆時我們會看到這個抗議是否會被學生和學者所支持。現在結果還未知。但是 Jena 的社會學家，以其全德國的社會學家，都希望全球可以一起加入這項抗議！

更多資訊請到：www.soziologie.de/che ■

> 可綁架性

墨西哥都市暴力的常態化

Ana Villarre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Ana Villarreal在Facebook上的繪圖。他是一名31歲的公司負責人，在2012年於辦公室被綁架。雖然其家人付了很多贖金，可是還是被撕票，屍體被丟在公路上。這個案件讓許多人重新把辦公室遷到很遠的地方，在家附近或是家裡。

Carolina 帶她 7 歲的小孩去看 Rapunzel 電影，但是從此後悔莫及。幾個月下來，Mariana 一直恐懼有人會爬進窗戶綁架她。「我感覺總有壞人在那邊。」她告訴媽媽。這段對話是我在訪談她時說的。她邊喝著咖啡，邊坐在一個高級的陽台上。「你說得對，但是妳也不用成天一直擔心這個。」媽媽說，「第一，這不是城堡；第二，你沒有魔法；第三，我都跟妳睡在一起，不像她們卡通中的人都分開很遠。」該電影讓小朋友們有很多恐懼的想像。「Fuck 迪士尼！」Carolina 生氣的說：「為什麼他們要拍這種綁架的電影？」

電影引起了許多墨西哥人當今的害怕：害怕被綁架。綁架曾經是上層階級的例外經驗，但現在卻不再是例外。Monterrey 擁有 4.5 百萬的人口，曾經被譽為是企業家都市，如今卻是毒品、暴力新聞的頭條所在地。被吊起的

>>

屍體懸掛在高速公路上，這福景象讓全世界怵目驚心。可是暴力每天都在惡化，其他的犯案也在急速增加中。

最近的一項墨西哥智庫研究指出，綁架是犯罪行為中影響人們最大的，被認為最不安全，比殺人或組織犯罪更高 (CIDAC, 2012)。官方犯罪統計資料很不可信，因為被害者和其家庭不太可能報警，因為對警方和司法的不信任。然而，比較可信的資料指出綁架率可是一直在升高中，在 Nuevo León (Monterrey 所在州) 更是如此。這裡我想要檢視為什麼墨西哥都市的綁架如何常態化。我利用的是我正在進行的田野，說明綁架如何進入了日常生活的實做裡面。

你知道暴力越來越常態化，特別是進入了日常語言和生活之後。語言來說，過去兩個月我開始聽到新的詞彙被發明出來描述這種暴力現象。至少在中上階級中是如此。人們開始討論他們是否具有「可綁架性」。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是在 2013 年 1 月 25 日從一個 43 歲的中上階級女性口中得知。她叫 Lucia，決定要放下一切恐懼，到市郊的別墅去。她們的別墅有很大的游泳池，環繞棕櫚樹，是個兩層樓的別墅。但是因為該區治安很糟，她們一直不敢去。「我的家人勸我別去，因為我具有可綁架性。」我有一次到過那邊，享受陽光並喝酒。可是她說：「雖說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武力劫持，可是在那邊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你在那邊會被孤立，會被綁架，因為你具有可綁架性。」

第二次我聽到這個詞是從 Santiago 口中。他是一個 28

歲的年輕人，住在中產階級區域。我們的訪談在 2013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他說：「我知道我不具有可綁架性，我的收入大約每月 17,000 pesos，所以一個人來說很夠用，可是要怎麼存錢？若是我的收入為 100 或是 200,000，那我則具有可綁架性。我的車子是 2002 Cacalier。」關於車子這點很重要。許多 Monterrey 的居民已經把車子變成分散的生活方式。有人把一台 BMW 賣個 Santiago 的朋友，因此讓他很擔憂。這位朋友堅持沒差，因為是一輛老車，可是 Santiago 告訴他綁架者才不管車子新舊。所以，可綁架和避免可綁架是這些人關心的事情。

在這個賣落下，暴力的常態化從動詞 secuestrar (綁架) 變成了形容詞。高綁架率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分類，連結到犯罪，並且把人口分裂成兩群：那些自認屬於危險族群的，和那些不這麼認為的。可綁架性，在這個賣落下，成為了特徵，可以從其他行為中去預測，像是消費模式、行程、工作、交通方式等。

「他們不必要去知道這些事情正在發生。」Carolina 在訪問結尾時補上這句話。「我還是想要去保護她們，保留這個天地，保留童年。」Carolina 說她不認為她是可綁架的，但她也會小心不要離開這個比較富裕的居住區域，也從此不再戴 Cartier 的手錶，或是開敞篷車。她也不看報紙、不看電視。她鮮少晚上出門，而且把社交圈限於她的朋友、學校、家庭。她很小翼翼地建構這個小天地給 Mariana，也試著保護自己。可是，訪談的最後，她

隨口說：「我想知道人們是怎麼活在戰爭區域中的？他們是怎麼辦到的？怎麼化解焦慮？想必很可怕！」■

References

- CIDAC (2012) 8 Delitos Primero. Índice Delictivo. Centro Integral para el Desarrollo, A.C.
- México Evalúa (2012) Indicadores de víctimas visibles e invisibles de homicidios.

> 墨西哥青年的

社會分化

by Gonzalo A. Saraví,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Higher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CIESAS), 墨西哥

墨西哥的不平等蔓延全國。在平庸的經濟成長和其他社會指標的停滯之後，墨西哥的不平等惡化許多。即使教育水準提高，社會福利擴張，現金轉帳的系統，像是 Oportunidades 普遍可見，但是這些對抗貧窮的制度並不怎麼有效。

然而，在許多國際性進步指標的達成底下，不平等持續惡化。在這種反差現象之外，一種新的稱之為「不平等納入」的現象出現了。特權和剝削隨處可見，彼此忽視卻又默許之。不平等造成了一種質性的跳躍：社會結構的分裂不但是種不平等，還是社會與文化的相互排斥。

這個分裂過程在成人化之中特別明顯。小孩和青年是人生中的重要階段。而這個階段的機

會與限制是往後未來發展的關鍵。此外，這個階段更是社會化和主體化的重要環節，決定了人生後來屬於什麼樣的社會或文化範疇。這個主題的研究文獻累積了一定的成果，可是對於不平等如何造成社會分裂的議題來說，還是很少人碰觸。成人化和青少年經驗是探討社會分裂的理想指標，在結構或是文化上皆是如此。

墨西哥的教育機會從過去幾十年來成長很多。在 1990 和 2010 之間，基礎教育(9 歲)已經相當普及，25-29 歲的人平均教育年齡從 7.9 增加為 10.2。此外，憲法改革也延伸了義務教育年限，2011 年成為 12 歲。可是教育系統也因此分化。特權階級的小孩都去唸私人學校，享有更多資源。而下層階級的小孩到同質性很

高的公立學校，基礎建設比較不好，資源也較少。結果就是造成教育成就的分化。在一項 2006 PISA 的科學測驗中，只有 25% 的前 1/4 社經地位的學生沒通過，可是第二個 1/4 社經地位的小孩有 56% 沒通過，後兩個 1/4 社經階級的學生則有 71% 沒通過，可謂相當懸殊。

分化的結果不只限於教育成就上。分化延伸到學校經驗和教育的意義之中。對於上層階級的小孩來說，學校是一種封閉的場域。其生活很大的一部分跟學校有關，是社會化、認同、社會資本形成重要部份。其社會網絡的同質性延伸到其他場域，從小到成人皆是如此。學校是成人化的唯一管道，教育路徑非常線性單一。同時，下層階級的小孩和年輕人則完全

>>

不同。他們所接觸到的影響比較多元。因此，對這些人來說，教育是過度的階段，學校隨著年紀增長也越來越不重要。

教育的分化也和都市分化有關。墨西哥就像其他國家一樣，其都市有著嚴重的居住隔離現象。例如，像是貧窮的邊緣人口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邊緣化。有錢人集中在某個特殊區域，與世隔絕。這種區隔和孤立是精英的特權。他們害怕都市的危險，這種害怕也擴散到中產階級或是更低的階級，成為他們向上流動的動力來源。

社會空間的分化程度是超出居住隔離，並且進入了小孩和青少年的社會生活之中。居住、學校、購物、娛樂等，這些都是社會空間的運作模式，決定了一個人的都市經驗。空間在此表示著社會關係。這個社會過程創造出了一種特別且不平等的空間結構：貧窮和富有的年輕人彼此互斥，不管在地

理上或是在經驗上皆是如此。

他們對於正常都生活的定義是鑲嵌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之中的。舉凡交通、居住、街道、綠化空間，甚至行動、穿著、講話方式等，都大不相同。這不僅代表了不同，也代表了不平等，更代表了空間的相互排斥。

即使當隔離的程度減少時，都市生活也因為大家都避免接觸他者。享有特權的年輕人因此從公共領域撤退，自我隔離開來。有錢人讀私人大學，在高級的購物中心和飯店，有私人轎車代步。我所訪問的20名私校學生中，只有3個人沒有車子，而其他19個公立大學生中，沒有任何一人有車子。後者更有90%是用大眾運輸系統，一週超過3天以上。相反地，私校學生只有15%有這種經驗。

精英沒有從公共領域退守的豁免權。新型的半公共領域浮現了。

這種半公共領域和各種私人安全連結在一起，成為階級的界線。但是開放的公共領域被大多數人所佔據，社會互動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此外，城市之外的年輕人多數待在廢棄和禁止的空間中。和陌生人的互動不可避免，但是卻被污名化，或者被限制在某個社會階級裡面。

如此的社會分化有兩個意義。第一，這是在社會指標背後的一個機會因素得以讓不平等納入更惡化，並獲得社會支持。第二，這樣的社會排斥與文化空間的分化會使得集體責任弱化，也會使得他者的認知與瞭解弱化。總之，社會分裂惡化了不平等，也瓦解了社會連帶。■

> 當代日本的不平等

by Sawako Shirahas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member of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2014 ISA World Congress, 橫濱, 日本



哈佛社會學家和東亞專家Ezra Vogel的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published in 1979, 成為

戰後的日本，社會不平等之辯論可謂相當激烈，所以階級和日本特殊性的模糊界線交織在一起。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工業化的國家，而戰後的1950年代快速的經濟成長轉變了日本工業，使得日本躍升為世界經濟強國。美國社會學家Ezra Vogel (1976)的著作：Japan as Number One就稱讚了日本的制度，廣受日本讀者的歡迎，因為這本書激發了日本人的優越感。在經濟方面，日本是可以昂首闊步，可是國家因素的討論卻有點太過自滿。那些日本特殊性的言論總是有這樣類似的因果論證：因為是日本，所以經濟那麼成功。這未免過於誇大。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全日本都是「中產階級」的言論儼然是流行標語。雖然成長或有緩慢些，可是平均所得都在上升，

多數人都買得起房子和車子。在一個1976年所得分佈的研究中，OECD發現日本是最平等的國家(Sawyer, 1976)。這個變成了後來的「日本例外論」之根據。也是所謂日本整個社會都是中產階級的主要論證核心。但是到了1980和1990年代，許多人開始對此產生懷疑了。

日本在1990的泡沫經濟後進入了長期的經濟蕭條。失業率攀升，特別是50到60歲的人口最嚴重。他們多數是高中學歷。而數字從1990年代的6.6飆高到2002年的12.8。更重要的是，傳統日本的勞動是終身保障，但後來就取消了。其中一個主要推力是50和60年代的經濟條件讓公司可以馬上訓練剛畢業的高中生，馬上可以提供他們穩定的收入保障。終身職的系統提供了勞工一個有保障的未來，讓他們可以規劃人生。可是現在情況完全相反。幾乎一半的勞工都是非典型雇傭，根本無法經濟獨立。

此外，年輕人認為經濟沒有保障前不願結婚，因為沒錢可以養家活口。然而，年輕女性宣稱他們生了小孩之後會被家庭綁住。很明顯地，性別不平等深深鑲嵌在家庭裡面，是當代日本不平等的一項重要

因素。家庭是日本社會制度很重要的一環，也是提供安全很重要的角色。擁有家庭可以減少經濟負擔。事實上的確，單親媽媽和獨居的婦女在經濟上相當邊緣。

性別和世代是結構日本不平等的兩大因素。不過，相關的研究很少。如此的研究其對於檢視各項日本公共議題來說相當重要。的確，我們可以說，全球工業社會的問題都該被放在不平等的框架下來討論，這個框架可以看出各個國家之間的異同。■

References

- Sawyer, M. (1976) "Income Distribution in OECD Countries"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 Vogel, E. (1979) Japan as Number O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俳句

簡單的美

by Koichi Hasegawa,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and Chair of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ISA 2014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橫濱, 日本



在Higashine市的松尾芭蕉雕像。Koichi Hasegawa攝影。Photo by Koichi Hasegawa.

「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詩。原本是傳統日本文化，而現在則在其他語言文化中都可見其身影。傳統的俳句只有少於 17 個音節，分佈於 3 行中，依序 5-7-5 個音節，要求要有一個字代表該年的季節。不過後兩者只有在俳句的寫作中應用。俳句的歷史遠溯於詩人松尾芭蕉 (1644-1694)，他同時也是旅行家。從那時起俳句就變成了日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主要的報紙每天刊登俳句，並解釋其中意義。每週也選出讀者投稿的俳句，通常要從 40-50 個中選出一首，有 4-5 個評審，可謂相當競爭。俳句詩人也在週末會聚首討論，相互分享，切磋技藝。日本至今已經有上百萬首俳句，愛好者更不計可數。

俳句的本質就是簡單。這個原則同樣被日本禪宗所秉持，其他像是茶道，日本料理等也是。簡單，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也象徵日本的美。傳統日本藝術作品通常會大量

留白，沒有太多顏色、線條。這樣是邀請觀賞者一起進入作品去詮釋與對話。俳句的精神也是如此，只著重在其中的 1-2 個字。細緻的弦外之音就由讀者去體會與猜想。總之，俳句體現了簡單之美。

社會學的朋友們，讓我介紹最有名松尾芭蕉的俳句。松尾芭蕉是 17 世紀俳句的創始人。一位日本文學專家、哥倫比亞大學的退休教授 Donald Keen 把其中一首俳句翻譯成英文：

The summer grasses -----
Of brave soldier' s dreams
The aftermath.

這首俳句是松尾芭蕉作。那時他到 Hiraizumi，也是現在日本的 Iwate Prefecture。當時那是一個 12 世紀著名的戰場。每年夏天，雜草叢生於該地。可是，這個地方代表了自然永恆的力量與循環。此外，戰士最期待的就是夢想與希望。所以從這短短三行內，松尾芭蕉生動地對比了自然的永恆和政權的短暫。我們也看到俳句充分利用了隱喻、對比、象徵等技巧。不過也要運用得當。總之，嚴謹又自然地修辭是俳句最重要的特色。

自然對日本人來說相當重要。季節分明的日本讓人們非常珍惜季節的意義與交替。舉例來說，你們知道有多少種表達「雨」的方式嗎？一般日本的字典有 160 種關於雨的字，像是「軟雨」、「花雨滴」等，代表花開前的降雨。日本文化有各種精緻對雨的表達。如此深刻的文化特色吸引了全世界的俳句

迷們。我是個俳句迷，每個月會寫 10 到 12 手俳句。我除了是社會學家，也是俳句詩人，出版了我自己的俳句集，叫做 Ryoku-U (在綠色季節的雨)。而作為環境社會學家，受到環境挑戰、事件、議題、災害等的啟發，而創作俳句就像是對社會、自然、人生的瞬間捕捉。我願意用松尾芭蕉得另一首俳句當作本文的結尾：

Have the rains of spring
Spared you from their onslaught,
Shining hall of Gold?

Hiraizumi 現在是 UNESCO (<http://whc.unesco.org/en/list/1277>) 的世界文化遺址，也是松尾巴創作「的夏日的草」的地方。此處距離橫濱只要三小時車程。俳句和社會學有許多相見之處：分析、批判、紀錄社會與自然的生活。■

> Bilba的執行委員會會議

by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A會長



Bilbao的執行委員會會議。

ISA 執行委員會的年度會議在 Bilbao 舉行，為期 5 天。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很熱心地提供場地，並且執委 Benjamín Tejerina 教授和其社會系的同事相當幫忙。其中 2 天舉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是「危機之外：社會學面對新的風險、不確定、危險」，由許多委員和其他的學者參與。

為期 5 天的馬拉松會議由各個計畫委員會分別討論在 2014 年的世界大會籌備事宜，由出版副會長 Raquel Sosa Elízaga、計畫副會長 Jennifer Platt、財務副會長 Robert Van Krieken、研究副會長 Margaret Abraham、以及國家學會副會長 Tina Uys 等人共同主持。

另外，大家也共同討論，為期 2 天。過去這一年來，我們完成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台灣（台北）的博士生 Lab、Buenos Aires 的 ISA 論壇等，為 2014 世界大會立下很好的基礎。我則報告了到各個國家去聯繫串連組成 ISA 數位化的工作

（包括 Global Dialogue, Universities in Crisis, Public Sociology Live, Journeys through Sociology 和發展中的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執行委員會也確定了 2018 年的世界大會將由 Toronto 舉辦。另外 2016 年的大會仍在討論中，有 3 個城市候選，分別為 Budapest、Copenhagen、Vienna。我們最後小名單是 Budapest 和 Vienna。之後會做最終決定。

其他事項還包括：

討論重組 ISA 行政架構，使得各計畫委員可以更佳利用執委會。這個新的委員會由會長負責，由各副會長組成。目前大家正再線上投票。

1. 建立一個機制可以讓 ISA 可以公開為受到人權迫害的社會學家發聲。
2. 建立一個讓不便者可以參加會議的友善環境。
3. 建立一個對外募款的委員會。

>>

4. 建立一個新的獎項：[Excellence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 Margaret Abraham, 研究副會長

研究協調委員會 (RCC) 在此次會議收穫頗豐。我報告的第二次 ISA 論壇 (Buenos Aires, July 31-August 4, 2012) 的成功結果。有來自 84 個國家，3592 個人註冊參與，超過 650 個場次。社會正義與民主化會議成功落幕，我們正籌劃下一次。

各個學會也討論的規章，而主題工作小組們也審視修改了規章，把 RC 規定要在下次選舉前完成這些工作。RCC 也檢討了 2011 和 2012 的獎助分配，討論 2013 年的分配。RC37 (Sociology of Arts) 的獎助案通過了。主題小組 05 (Visual Sociology) 的升級要求也通過。新的主題小組是社會工作，不過經過仔細討論後，因為重複，所以不成立。

RCC 也討論的橫濱 2014 世界大會的相關事項，包括：

1. 升級線上系統，並從論壇得到經驗，由 RC 協調。
2. 10 個的大會整合提案做出選擇。
3. 提昇獎助的使用，並透過各個小組提供註冊的協助。
4. 訓練新的小組人員參加研究委員會的議程。

我也很高興告訴大家 ISA 的財務委員會允諾給予額外 10000 歐元的經費去支持註冊費。

> Raquel Sosa Elízaga, 計畫副會長

過去 3 年來，計畫委員會在 3 次的年度執委會會議中討論了許多議題，參加成員包括了 Michael Burawoy (ISA 會長)、Margaret Abraham (研究副會長)、Tina Uys (國家會副會長)、Elena Zdravomyslova、Benjamín Tejerina、Sari Hanafi、伊慶春、我 (計畫副會長)。Koichi Hasegawa 則以日本籌備委員會的主席身份參與。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傑出學者，包括了社會不平等的專家們，

接受了我們邀請成為永久出席委員：Edgardo Lander、Göran Therborn、Kalpana Kannabiran、Markus Schulz、J. Esteban Castro、Boaventura de Souza Santos (無法參與會議)。這些學者帶來了高品質的討論與辯論。此外，彼此的合作也讓我們開始準備 [Facing Inequality](#)。這會在線上出版，也會成為我們的基本論述，去架構一個可以觀照所有不平等問題的框架。這個努力很重要，因為這關係著全球學術合作與貢獻。結果會由我們委員會發表。

委員會也討論了會議場次的長度要如何對於世界大會有所貢獻。主題的多元性讓我們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加深我們的合作。這些包括了 Integrative、National Associations、Ad Hoc 等場次，也有作者面對讀者的規劃。在地委員會和會長的額外場次已經通過。世界大會的主辦將是聯合國要求要達成千禧年發展目標的其中一項。我們衷心期盼可以瞭解全球不平等以及找出應對之道。

>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會長

出版的部份運作相當順利，有許多新的進展和改變。

第一期 Current Sociology 和 Sociopedia 合作，於今年底會發行。內容將會包括各種主題，例如社會衝突、災難、健康、疾病等等，這些目前只有在 Sociopedia 上可以看到，所以將來會有更廣泛的讀者閱讀到。第二期的徵稿即將開始。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 也接受各種回顧對象，像是電影這種非傳統的書。eSymposium 則在搬家中，它會在我們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網站 <http://sjd-space.sagepub.com/> 上看到，只有會員可以閱讀，下一期才會開放。Vineeta Sinha 是現在的主編，成為了網站的負責人，下一位將是 Kelvin Low。

為了幫助我們回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也為了國際社會學會的社群，一份線上的調查會問各位關於 Current Sociology 和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的意見。結果將在世界大會上討論。

我們出版的書：Sage Studies in Interna-

>>

tional Sociology 有一個相當有創意的收費方式。圖書館的紙本還是會繼續印刷，但是低價的紙本將會提供給 ISA 會員和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第一本這樣的書會是 Key Texts in World Sociology。

許多國家對於開放使用期刊的情形有來自許多資源的支持，所以也需要新的法規去處理這整個事宜。只要作者同意，然後付一些費用，那麼這篇文章就馬上開放。而對於那些認為一年後才可以開放的，那麼就不用付任何費用。

> Tina Uys, 國家學會副會長

國家會學的協調委員會在 2012 年有許多進展。最重要的是在 2013 年 5 月 13-16 日於土耳其 Ankara 的國家學會會議。場 替 由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METU) 所提供。這次會議主題是「動盪年代的社會學：比較方法」。這場會議將會由將近 40 個國家和 70 個代表出席。我們再次要特地感謝土耳其在地的籌辦委員會，以及 Doctor Ayse Saktanber 的負責，他是 METU 的社會系系主任，很熱心負責籌劃了整個會議。

沙烏地社會學會和社會工作學會申請加入集體會員，再討論規章之後通過了。現在 ISA 有 57 個集體會員。我們也檢討了申請程序，不過這部份的結論要等到下一次的國家學會和執行委員會的年度會議才可以決定。

吉爾吉斯斯坦社會學會、伊伯利亞半島社會學會、比利時社會學會、莫三比克社會學會報導了區域會議的相關事情。這些會議由 ISA 贊助，而且在討論後通過。

網站升級的資金已經給予 Argentinian Consejo de Profesionales en Sociología、和阿根廷、澳洲、科羅埃西亞、德國、伊朗等國的社會學會。Finnish Westermarck Society 得到了辦理區域博士工作坊的獎助，主要參與者是北歐國家。NALC 在申請時強調了區域的重要性。

> Robert van Krieken, 財務副會長 會員

本委員會檢視了集體會員和個人會員的情況。在 2012 年 12 月達到最多人：5300 人次。

研究、工作、主題委員會的會員情況也是討論的項目，包括了有 4 個研究委員會的會員數目減少，以及有許多快速成長的委員會：RC07 Futures Research, RC09 Social Transformations &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RC13 Sociology of Leisure, RC19 Sociology of Poverty, Social Welfare & Social Policy, RC21 Regional & Urban Development, RC31 Sociology of Migration, RC32 Women in Society, TG03 Human Rights & Global Justice, TG04 Sociology of Risk & Uncertainty, and TG05 Visual Sociology。

有些人關心終身會員比例增多的現象，以及詢問執行委員看法。Ishwar Modi 和 Tom Dwyer 的委員會分析了會員數量，並建議了許多關於增加會員的事項，包括了成立次級委員會去負責會員這塊。

財務

委員會指出會員費有稍為降低的趨勢，其他項是期刊的專利費、利率等也有。而各項 ISA 的運作支出也有點增加。不過 Sage 部份的收入增加很多。

2011-2012 的財務報告會放在 ISA 的網站上。

其他資金的申請結果由執行委員會做最後的決定，包括了國家會員參與橫濱大會的額外補助，以及橫濱大會的計畫委員會議。這都屬於世界大會的預算項目。■

> 介紹波蘭團隊

公共社會學研究室

by Karolina Mikołajewska, University of Warsaw and Kozminski University, 波蘭

學生組織「公共社會學研究室」於2011年正式成立(波蘭文: Kołło Naukowe Socjologii Publicznej), 隸屬於 University of Warsaw 的社會學研究所。我們是一群大學生和研究生, 共同有著類似的興趣, 以 C. Wright Mills 的話來說, 就是關心公共議題和個人關懷之間的連結。我們致力探索這類議題。

我們也從事各種學術行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翻譯全球對話的波蘭版本。在第 2.4 期中我們也有一篇文章敘述 Sztompka 和 Burawoy 之間的辯論, 這和波蘭學術問題息息相關。該文也是相關討論的其中之一。這個辯論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除此之外, 我們也舉行各項研討會。目前正在籌劃組織一個波蘭社會學學生組織。總之能夠加入全球對話的大團隊, 是一件令人再興奮不過的事了。相信這會有助於將公共社會學的影響力帶到波蘭之外。聯絡我們: public.sociology.kn@uw.edu.pl ■



Adam Müller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會學院碩士, 現在是博士候選人。興趣是合作銀行與道德經濟。



Karolina Mikołajewska

University of Warsaw 碩士, 現在是博士候選人。Center for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s and Workplaces (Kozminski University) 的教學與研究助理。興趣是經濟人類學, 社會學, 勞動關係, 組織研究。



Krzysztof Gubański

就讀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會系和文化研究系。Ludwig 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unich) 就讀一年。興趣是經濟社會學、都市研究、論述分析。同時是學生組織的活躍成員。現在撰寫波蘭高等教育為主題的



Mikołaj Mierzejewski

就讀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會系。興趣是高等教育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經濟社會學、階級分析、公共社會學。是 New 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的成員, 負責研究該組織, 聚焦在學術的變遷上。



Jakub Rozenbaum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會學研究生。以私有產權在共黨之後的復甦為題撰寫論文。興趣主要是勞動關係、公民(特別是青年)參與，住屋問題。大力支持社會學界入社會變遷。



Anna Piekutowska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會學研究生。興趣是社會運動、社會經濟、性別社會學、性。之前研究包括女性主義組織對於波蘭女性的影響。碩士論文是社會合作作為社會包容的方法。



Tomasz Piatek

University of Warsaw 的 Robert B. Zajonc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博士生。主要領域是教育社會學，青年研究、批判教育、社會學家的社會責



Julia Legat

University of Warsaw 畢業，現在是社會學研究生。主要興趣是社會運動，公民參與，社會不平等。



Zofia Włodarczyk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會學研究生。正在撰寫關於鄉村女性自傳的能動性論文。主要領域是公共社會學、公民參與(特別是青年和鄉村地區)，傳記社會學。



Emilia Hudzińska

University of Warsaw 國際關係研究生。現在興趣是美國研究和去殖民。曾經畢業於該校社會系碩士。現在的論文關於波蘭政治精英之間的權力關係。

> 加拿大社會學 敞開雙臂歡迎各位！

by Patrizia Albanese, 加拿大社會學候任會長; 2018世界大會在地委員會主席, Ryerson University, Toronto, 加拿大



Toronto 的社會學者和 Michael Burawoy 和 Izabela Barlinska 見面，討論 2018 世界大會。上排左到右：Lorne Tepperman (University of Toronto)、Cheryl Teelucksingh (Ryerson University)、Izabela Barlinska (ISA Executive Secretary)、Bob Andersen (University of Toronto)；下排左到右：Nancy Mandell (York University)、Patrizia Albanese (Ryerson University)、Lesley Wood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社會學很高興跟各會宣佈一個好消息：Toronto 被選為 2018 年 ISA 世界大會的舉辦地點！我們希望可以增進彼此的瞭解。加拿大社會學雖有獨到之處，但也相當友善，並且也具有批判與反身的活力。所以，在此就讓我們作個自我介紹一下吧！

相對於說明加拿大社會學是什麼，我們比較容易去說明加拿大社會學不是什麼。所以，加拿大社會學不無聊、不刻板、不鐵板一塊、也不容易用三言兩語說盡。

社會學向來就對外開放，與不同學科間彼此交集。所以我們是個多元的專業，不怕向外延伸觸角，集思廣益，也不怕踰越規範。我們聚焦在社會上，來來回回思索問題。我們更不停質疑，甚至質疑我們自己。過去多年來，加拿大社會學已經不斷審問自己：我們是誰，

我們作些什麼，以及我們為什麼要作這些事情。像是 Robert Brym (2003)、Neil McLaughlin (2005)、Doug Baer (2005) 等人已經辯論過加拿大社會學是不是處於危機之中的議題了。我們認為這種討論是一個學科健康的象徵。Mark Twain 說過：「對我死亡的報導是言過其實了！」

加拿大社會學生氣蓬勃、欣欣向榮。加拿大社會學會的組織不斷成長，期刊也很有活力。Reza Nakhaie (University of Windsor) 是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CRS) 的主編，也是最資深的審稿人，他最近發表了一篇過去 45 年來該期刊的歷史回顧。他說：「CRS 發表的文章對於建立社會學者之間的對話相當有幫助，對於其他知識分子也是！CRS 代表了加拿大主流社會科學的聲音，也扮演著批判反對的力量。所以，CRS 是一份提供加拿大社會學者彼此之間批判對話的平台，也是學術累積的期刊。」

我們所希望的是我們這個學科會一直僅僅貼近社會脈動。社會學一旦脫離社會，那麼恐怕也氣數將盡。有一項針對 54 個加拿大使用英語之社會系的研究指出，批判的思考，博雅教育的基礎，將對大學社會系有深遠的影響 (Puddephatt and Nelsen, 2010: 423)。若我們可以達成部份的目標，並且為大學生甚至研究生多作些努力，那麼這個學科的價值更是表露無遺。

讓我簡單作個結尾。我要分享一些加拿大社會學加的觀點。我們邀請了學者表達他們心目中對加拿大社會學得看法，整理如下：

加拿大社會學在許多方面都很特殊，包括語言、宗教、教育、理論取徑、經驗研究等。若其中有任何共識的話，那就是去整合美國和歐洲的傳統，重視歷史，多元方法，比且致力批判。其首先繼承了自由主義的傳統，然後馬克思的新政治經濟學，到最近的去殖民、女性主義、後現代、以及浮現觀點。較不被重視的

>>

是古典理論，這應該世家拿大社會學的健康指標。(Dr. Howard Ramos, 副教授, 社會與人類學系, Dalhousie University)

在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的研究生討論課裡面曾經討論過這個，讓我貼出來分享：「加拿大相異的人口組成，加上多變的自然與地理環境，對於社會學來說是個挑戰。加拿大社會學有能力去瞭解這個異質性高的社會，並且批判性地指出常識性觀點下的真實運作。」

Dr. Nancy Mandell 是 York University 社會系主任。這是加拿大的大系之一。她有如下的看法：「我們所傳承到的優勢，來自於 1960 年代的批判社會學和其應用，讓學生得以介入社會。我們系主要是批判地去挑戰傳統預設和追求社會正義，像是平等健康、性別自由、司法責任等。廣泛說來就是關心不平等、權力關係、意識形態等。此外也鼓勵社會運動。許多學者則強調歷史的核心重要性，特別是帝國擴張和殖民議題。這也幫助我們理解現在的社會。」

Aaula Graham 是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的社會學博士生，說：「從我研究社運的角度而言，加拿大社會學一詞蘊含著解放的意義。我可以理解那些想要辨認何謂加拿大社會學以及鞏固學科認同的努力，但是我覺得模糊的認同是有幫助的。我並不跟著歐美的腳步，也不使用其他詮釋方法，而是更廣泛地去和世界各個角落，包括加拿大，的文獻和理論進行互動。」

最後，我們期待與各位相見！讓我們一起共襄盛舉，在會場、酒吧、飯店內辯論知識，我相信這是嶄新且刺激的一頁。■

References

- Baer, D. (2005) "On the Crisis in Canadian Sociology: Comment on McLaughli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4): 491-502.
- Brym, R. (2003) "The Decline of the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8: 411-416.
- McLaughlin, N (2005) "Canada's Impossible Scienc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Coming-Crisis of

Anglo-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1): 1-40.

Nakhaie, R. 2010. "Les 45 années de la 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 (et d' anthropologie).

45 years of th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47(3): 319-325.

Puddephatt, A. and R.W. Nelsen (2010) "The Promise of a Sociology Degree in Canadian Higher Educ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47(2): 405-430.

> 給主編的信

回應Israeli Universities的Feras Hammami (全球對話3.2)

親愛的主編：

閱讀並比較全球對話 3.2 期 Feras Hammami 的「以色列大學的政治危機」一文之後，覺得相當有啟發性。André Béteille 說，作為社會學家，他說他的角色並非一位道德家；而 Jacklyn Cock 則從很政治的角度論述，並沒有美化或是醜化那些被論述的他者。這並不是因為道德責任不存在，而是因為她並不宣稱自己是道德的仲裁者。相較之下，那篇關於以色列的文章，則明顯把道德譴責擺在第一位，集中在某些著名的困難個案上，而且只引用運動者的資料。作者沒有任何學術或是報紙的資源去佐證其觀點（這裡畢竟是學術發表）。並且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員會在 2 月 13 日已經撤銷了原本要關閉 Ben-Gurion University 政治系的決定。

該文把個案詮釋成為廣泛的現象。的確，右翼團體會抨擊大學教授的言論，造成很大的壓力（像是 Neve Gordon 的案例），但是文章至少要提供一些其它嚴肅的證據，像是「為了避免公共毀謗、丟掉工作、送進監牢、甚至死亡，人員請把那些挑釁政府的言論刪去」這種宣稱從何而來？要說不小心漏掉了，其實有點說不過去。Ariella Azoulay 終身職被拒絕一事，的確飽受批評，而且質疑其政治動機。但是即便如此，作者還是有責任提供訊息來源，因為批評大學有政治立場一言，乃非同小可之事。

此外，該篇文章說到要抵制以色列違反個人自由政治迫害的舉動，我認為是有用的，位可以引發大家的道德良知以及讓以色列學術界去反思其政府的行動。可是，把全部的大學人員都看作是同一類並加以批評之，這並不合理。運動者若把焦點放在真正可以對政府產生約束力的地方，或許會比較恰當。我並不會反對取消某些以色列和歐盟之間的貿易關係，因為很多在 West Bank 出產的商品都被標上「Made in Israel」，這的確是個困擾沒錯。

和南非的對比則大有問題。在南非，大學和運動組織有明顯的歧視政策，但以色列沒有。所以整個抵制運動很狹隘，會傷害到專業知識社群，並且把學術進一步政治化。

David Lehmann, Cambridge University, 英國

親愛的主編：

Feras Hammami 對於以色列大學政治危機的闡述，論及了其學術界的默不作聲。多數人選擇保持沉默，特別是巴勒斯坦大學的議題上。但是，針對學術自由被侵害的案例，他們的反應大不相同。危機，或許是轉機。

以色列政府向來標榜其為在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的民主國家，擁有自由的學術環境。雖然其媒體稱讚阿拉伯之春，不過諷刺的是其民主與學術自由卻出了問題。有一些教授只被少數的異議人士支持，不過卻受到國際的大力相挺，這幫助減輕了許多原本會更嚴重的迫害程度。以 Ben-Gurion University 為例，國際就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去揭露以色列政府對言論自由危害的不聞不問。高等教育委員會已經邀請國際去討論這個案例，可是，來自以色列復國主義者的巨大壓力，其已經把 Neve Gordon 教授視為是反猶主義者，並鎖定批判他。

高教委員會屈服於此利益團體的壓力，所以在 2012 年宣佈關閉該系。不過許多其他教授（除了只有少數來自核心科技中心像是 Weizmann Institute）立即意識到此事對於以色列大學的嚴重性。一星期內以色列學術界就有 300 人請願批評該項決定。國際也大力聲援。Ben-Gurion University 本身也從法律角度抗議，認為嚴重違反了學術言論自由。甚者，國際審查會宣稱其並沒有建議關閉該大學，質疑高教委員會背後的政治動機不單純。此外，也質問為什麼類似的 University of Bar Ilan 就沒有被關閉？

飽受抨擊的高教委員會延緩了關閉的決議，延後大一月大選後。右翼政府上台後並沒有執行關閉的決定。二月以色列自由派的媒體 Haaretz 報導關閉的決定已經被取消，而國際團體則聲明要繼續關注追蹤此案。

我們希望的是以色列學術界已經經歷到了學術自由被侵害的嚴重性，並且國際間相當關注且支持學術自由，這點可以讓其充分體認到學術自由的不可剝奪，以及巴勒斯坦的學術也需要學術自由。這是個危機中的轉機。

Hilary Rose, Bradford University, 英國